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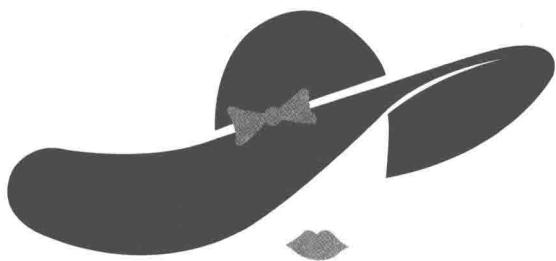
包法利夫人

Madame Bovary

译



浙江教育出版社
ZHEJIANG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包法利夫人

Madame Bovary

[法]福楼拜 著 罗国林 译



浙江教育出版社·杭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包法利夫人 / (法) 福楼拜著; 罗国林译. —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18.7

ISBN 978-7-5536-7446-9

I. ①包… II. ①福… ②罗… III. ①长篇小说—法
国—近代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32308号

责任编辑	陈颖	产品经理	聂文	李梦霁
美术编辑	曾国兴	责任校对	李剑	
责任印务	陆江	特约编辑	李盈	

包法利夫人

[法] 福楼拜 著 罗国林 译

出版发行 浙江教育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40号 邮编: 310013)

印刷 北京鑫海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成品尺寸 145mm × 210mm

印张 11.75

字数 310000

版次 2018年7月第1版

印次 2018年7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36-7446-9

定价 42.00元

联系电话: 0571-85170300-80928

网址: www.zjeph.com

序

《包法利夫人》是一部伟大的书。作者福楼拜在他生活的 19 世纪，得到的威望和对他的评价远不如现在。那时候在法国，人们更推崇夏多布里昂、雨果。而《包法利夫人》经过时间的沉淀，成为现在公认的最伟大的作品之一。

在很多欧美文学书单中，比如“人类历史上百本必读书籍”，《包法利夫人》总是榜上有名，而且名列前茅。它之所以会得到这么高的推崇，是因为它实在是一部人性的百科全书。虽然它是一部写女人的小说，但它把“人”所包含的各种问题都写透了、写薄了。而且福楼拜是用“多一个字也不行，少一个字也不行”的标准，用很精练的语言讲出了一个如此生动的故事。

《包法利夫人》有一个精心构思的故事脉络。

故事是关于爱玛这个女主人公的欲望与堕落的。这部小说很怪，一开始读你会以为小说是写包法利先生的，因为小说前面讲包法利先生的故事就用了很多章节，而且故事非常精彩，让人印象深刻。我猜测，有可能福楼拜当时就是写的包法利先生和他的第一任妻子杜布克夫人的故事：杜布克夫人是一个有钱

的寡妇——也可能没什么钱，为了得到包法利先生和公婆的关爱，很可怜地夸大了自己的财产。光是沿着这条线索写，也能写出好故事。

但是，主人公爱玛出现了。就是这样一个女人，使小说发生了特别奇怪的变化，使前面浓墨重彩描写的包法利先生一下子退居幕后，成为整个叙事的一个玩偶。这个变化只要读者读得仔细就会发现。一代一代的小说家都在学习和思考，这部小说为什么到这里出现了这么奇特的转向？世界上几乎不会有第二个小说家进行这样的构思了。

爱玛这个人物的出现，让我们感受到福楼拜大概也会脑中一亮：这个爱玛才是我真正要讲的故事。

爱玛一出场就是带有悬念的，爱玛的父亲是一个鳏夫，膝下只有她这一个女儿，两人相依为命。她本是特别娴静的人，过的生活却很压抑。福楼拜先生短短的几笔就把爱玛身上的矛盾性格点出来了。他说爱玛喜欢教堂是喜欢教堂外面的花卉，喜欢音乐是喜欢那些你情我爱的歌词，喜欢文学其实是喜欢文学的浪漫和刺激，这寥寥数笔交代的不仅是虚荣心，也把这个女人矛盾的不安分的内心勾勒出来了。爱玛少女时代进过修道院，在修道院，别人侍奉上帝，她却看了很多浪漫奇妙的小说。她就是在这样一个叛逆的暗流中长大的，这种天性使她想做贤妻良母又做不到，最后成了著名的包法利夫人。

小说后面还有一段描写让人印象深刻，爱玛住在永维镇这样偏僻的地区，却订阅了大量的巴黎上流社会的报纸和杂志，她知道巴黎哪个剧院在上演新的歌剧，知道巴黎高级裁缝师家的门牌号码。这也算是填补生活空白的方式吧。

这样一个心在高处的女子却一生生活在乡村小镇，这种生活也许本身就隐藏着种种危险。这种危险的悲剧，也许从她出生以后便开始了，而包法利先生的悲剧是从他向爱玛求婚时开始的，包法利先生向爱玛的父亲吐露他的心思，爱玛父亲回答他：“我嘛，求之不得。小女也许和我是一个想法，不过总得问

问她本人的意见。好啦，我不送你，这就把话带回去。如果她同意，请你听明白，你不必回来，一则防人口舌，二则免得她不好意思。不过，为了不让你等得心焦，我把窗子推开，推得贴住墙壁，你从篱笆上探过头，打后面就能看见。”飞蛾都是盲目而热情地向火扑去，如果说爱玛是火，包法利先生就是飞蛾。他求婚时在爱玛家外面的路上，魂不守舍地等了近一个小时，回头一看，窗子打开了，爱玛答应了他的求婚，火召唤着飞蛾，包法利先生和包法利夫人的命运，都在这一瞬间决定了。

最初这段平静的新婚生活，爱玛得到的只是一种安宁的感受，而包法利先生，这位所谓的痴情男子，他的感受是不一样的。福楼拜写了句非常精彩的话：“在他心目中，天地之大不超过她的罗裙的幅员。”一个女人在她丈夫心中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这样的男女关系是不对称的，也是危机发生的土壤。

小说中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细节，就是“燕子”号马车。爱玛每次都要坐着马车离开那个沉闷的、让人窒息的家庭，去满足她的欲望，或者说去找她的自由，一次次来往于永维镇和鲁昂，来往于宁静沉闷的小镇和大城市之间，爱玛的堕落轨迹也像这辆马车，不急不慢，来往于家庭和情人之间，来往于不同人的情爱之间。

那些情爱的场景，穿插于后面的故事之中。先是跟大学生莱昂恋爱，后来则是跟一个花花公子罗多尔夫恋爱。需要说明的是，在19世纪，福楼拜的小说观念已经非常进步，但写到爱玛与莱昂感情的邂逅还是非常有节制的，只是写两人讨论文学、音乐。有趣的是，两人对于文学和音乐都没有很深入的了解，在一起偏偏就喜欢谈论这些，这是因为共同的文化虚荣心，也就是所谓的两个人的共同语言。

莱昂是一个律师事务所的实习生，所谓见识广博、举止文明的年轻男子，爱玛和他走到一起有必然因素。爱玛第一次主动点燃了对方情感的烈火，但还

是保留了点理性。当爱玛挽着莱昂的手臂在街上走，只是被镇上的长舌妇说三道四时，并没有发生性关系。直到他们之间感情升温，就在一层窗户纸快要捅破的时候，福楼拜却来了个急刹车，莱昂在母亲的逼迫下，离开了永维镇，去别的城市工作。这就是福楼拜的智慧和高明之处，欲擒故纵。很明显，作者把莱昂设置成爱玛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情人的形象，爱玛的情感需要飞翔，要借助一个翅膀，就是一个她深爱的男性，而莱昂离去了，她的感情就像断了线的风筝，断线的风筝总是要落在地上的，飞过了，再掉下来，引起的是更深的飞的欲望，这欲望导致了爱玛后来变本加厉的感情游戏。

就在这时，罗多尔夫出现了，他是一个如假包换的花花公子，爱玛明明知道他的本质，但还是像飞蛾扑火一样扑向危险的情感游戏。所以说欺骗并不存在，存在的是悲剧性的欲望和悲剧性的命运。爱玛和罗多尔夫的第一次调情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情节，后来的许多文学讲义都提到这一段描写。

在永维镇当地举办的农业博览会上，台上是官员乏味的官僚主义的发言，台下是男女私情，台下的罗多尔夫东一句西一句地试探爱玛的情感，福楼拜先生特意设置了语言的间隔，读起来非常奇妙，堪称经典。一男一女的调情夹杂着一个官员慷慨激昂的发言，多么讽刺，多么有趣。

当然福楼拜一直在写爱玛内心的挣扎，写她在欲望与残存的道德感之间的挣扎和选择。一次次的挣扎把她推向一步步的堕落。“燕子”号马车其实如同一个邪恶的象征，她一坐上去，她的心就从家庭转移到外面的情人身上。结果是她一次次地投入爱情，一次次地背叛家庭和包法利先生，但同时自己也一次次被情人们背叛。

爱玛的悲剧结局是可以料到的，为了爱情她欠下高利贷，最后不得不吞砒霜自尽。一个女人为欲望所累，在欲望的道路上挣扎，结果离死亡越来越近。

这个故事讲的是女性的故事，但这个欲望的故事也可以影射男性，它写的

是人性的种种矛盾，爱玛浪漫、虚荣、自私、叛逆、不甘平庸，这一切似乎是人性正常的内容，不应该那么致命和邪恶，可是福楼拜描写的是在适当的社会条件下，寻常的人性之树开出了不寻常的恶之花！

到了小说的最后，有很多人手里都是拿着把匕首横在爱玛的头上的，爱玛付出生命既是一种逃脱，也是一种忏悔。这样一部作品可以说是人性的百科全书。

就是这么一个并不复杂的故事，福楼拜在创作它的过程中，基本上达到了一种堪称完美的叙事。这部小说是没法改的。很多伟大的小说，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你是可以给他改掉一些的，读起来会更舒服一点。但《包法利夫人》精练到你想要在哪里砍掉一句都是不对的，它经得住细细品读。

一方面，我说它是一部完美的作品；但另一方面，依我之见，伟大如这部小说仍然带有一点点缺憾，那就是作者本身逃避的东西。福楼拜自己没有子女，大概他也从来不观察孩子，但爱玛是个母亲，她跟孩子的关系在故事中是非常重要的。福楼拜回避掉了对于孩子的描述，他不会写孩子。但他不得不提，于是爱玛死后出现了这样一幕：包法利先生带着孩子去爱玛的墓地悼念她。可以说是很平面化的描写，直到最后都没有深入刻画过亲子关系。

人物关系中描写得最为精彩的是爱玛跟情人相处的部分，而在描写她跟包法利先生的相处中，包法利先生变成了一个阴影，一个影子一样的人物。也许是因为包法利先生善良到愚蠢，内心明白是怎么回事但是纵容了包法利夫人；也许是因为他真的一次次相信她拙劣的谎言，夫妻之间相处的描写是相对而言不够精彩的。

这部小说还有个很有意思的点，你首先会读出他与同时代的巴尔扎克、雨果的作品的不同。不同在哪儿呢？你也许会感觉到福楼拜不太关注社会现实。雨果就是直接写当时的现实，也就是当时的法国大革命，它是那个时期每个人都去面对、谈论、描述的；巴尔扎克的作品也讲述大革命。但是福楼拜在写一

一个女人，在写一个被欲望摧毁的女人，这在当时法国主流作家中显得很奇特。他为什么不写社会？你可能到最后会发现：他是反对法国大革命的，但不愿写明。这是我的一个猜测。

小说最后的细节暗示了他其实关注现实。小说的最后突然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跟小说没什么关系的内容，是关于伏尔泰的。伏尔泰那套鼓吹启蒙、鼓吹自由、鼓吹法国革命新价值观的东西，都被福楼拜在最后几页中骂了一顿。他转述了当时报纸上关于伏尔泰被关起来，以及在监狱里吃粪的小道消息。现实里伏尔泰是多么受人尊敬的启蒙思想家，但福楼拜用这个笔法写了对他的态度。可以看出他骨子里反对法国大革命，这是他与其他的作家都不一样的地方。

这是我从这个完美文本之中发现的某一些怪异之处、蹊跷之处。当然这只是我的分析和猜测，读者不一定要认同我的理解。

《包法利夫人》之所以被这么多专业的读者所推崇，恐怕是因为它不仅留下了一个完美的文本，还留下了一堆值得人们持续探讨的问题。比如我上文提到的，为什么开头是写包法利先生而不是包法利夫人；为什么在大革命的历史背景下，在人们都与时代联结得那么紧密的情况下，转而去写一个女人的家庭生活、她的爱情史，写一个女人被欲望所摧毁的故事，而且使这么一个并不新奇的故事成为一部伟大之书；为什么文本又不是那么均衡，逃避对孩子的描写，漠视包法利先生这个人物形象；等等。

《包法利夫人》留下了种种疑点，但这些文本的奇特之处都不影响它的伟大。也许正是因为这样，《包法利夫人》才成为值得我们长久探讨的、复杂而深刻的作品。

译者序

古今中外，多少真正伟大的文学艺术作品，一经问世，即遭到无情的非难、攻击、批判，甚至查禁、焚毁，后来仅仅凭仗历史的公正，才最终获得其应有的地位，成为人类共享的文化艺术宝库中的瑰宝，彪炳千古。居斯塔夫·福楼拜的传世之作《包法利夫人》的遭遇，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例。

福楼拜动手写《包法利夫人》，是1851年9月19日在鲁昂近郊的克罗瓦塞别墅。经过将近五年呕心沥血的创作，直到1856年5月才完稿。但誉写人誉写得一塌糊涂，他又不得不仔细校正，至5月31日，才寄给他在《巴黎杂志》供职的朋友杜康。《巴黎杂志》是一家半月刊，将手稿搁置了三个月，才决定从10月1日至12月15日，分六期连载《包法利夫人》。但该刊审读委员会致函福楼拜，认为他的小说需要删节，请他把删节的工作全权交给编辑部。福楼拜未予理睬，仅在来函背面写了“荒谬透顶”四个字。从10月1日至11月15日发表的几部分，倒是未做删节。及至12月1日那一期准备付印之时，编辑部一位负责人对出租马车里发生的场面（即莱昂与爱玛从鲁昂大教堂里出来

后，乘出租马车疯跑全城那一段），忽然感到担心，说：“这一段不合适，我还是把它删掉吧。”福楼拜对此十分气愤，但为了不使编辑部为难，便说：“你们要删节，悉听尊便，但你们必须说明你们做了删节。”于是，编辑部加了一条脚注：“审读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删去此处的一段，因为它不符合本刊的编辑方针。特此说明。”事情并未到此止步，接着12月15日那一期，编辑部又决定删去几处。福楼拜确实恼怒了。经交涉，在小说正文底下刊出他的抗议：“《巴黎杂志》出于我不赞同的某些考虑，在12月1日那一期里已删去了一段。在编辑这一期时，他们又顾虑重重，认为必须删去好几处。因此，我声明对后面发表的部分不负责任，读者看到的仅是片段，不是整体。”

《包法利夫人》一经发表，立刻在文学界和读者中引起了轰动。当时负责严密检查所有出版物的帝国检察署，看到这部轰动性小说——《包法利夫人》在发表时《巴黎杂志》竟“顾虑重重”，多次删节，该刊审读委员会还特地声明，所删去的部分“不符合本刊的编辑方针”。这还了得！检察署高度警觉起来，对陆续发表的每一部分仔细研究，很快决定对这本书的作者福楼拜及《巴黎杂志》发行经理洛朗比沙和印刷商比耶提出公诉。福楼拜等人很快收到传票，审判于1857年1月31日开始。负责宣读公诉状的是代理检察长埃内斯特·皮纳尔。此人是帝国政府豢养的鹰犬，后来出任内政大臣。他在公诉状里，指控《包法利夫人》“败坏公众道德，诽谤宗教”。其重点打击对象是作者福楼拜。公诉状最后要求法庭从轻处理杂志发行经理和印刷商，“至于主犯福楼拜，你们必须严惩”。

出庭为福楼拜辩护的是儒勒·塞纳尔律师。他在辩护词中肯定《包法利夫人》是“一本好书”“一本诚实的书”“这本书的思想，从头至尾是一种非常合乎道德、合乎宗教的思想”“它通过揭露令人发指的道德败坏来弘扬道德”。塞纳尔是巴黎律师公会成员，曾任国民议会议长，可谓声誉卓著，而又雄辩机

警。他的辩护词很有特色。当时，他如果不从肯定《包法利夫人》非常合乎道德和宗教这个前提入手，而从维护言论自由和维护艺术之于道德的独立性入手来进行辩护，那将是非常笨拙的。他不仅论证了《包法利夫人》是一本好书，而且肯定了它的艺术成就，强调它是作者长期深入、细致观察生活的结晶，赞扬了作者独特的艺术风格，甚至大胆肯定现实主义的描写方法。作为一个律师，在当时做到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

就在开庭前夕，当时影响力很大的诗人拉马丁，约见年轻的作者（福楼拜那时年仅三十五岁），对他表示支持。福楼拜问他：“先生，我因为写了这部作品，正受到轻罪法庭追究，指控我违背了道德和宗教，这一点你想得通吗？”拉马丁斩钉截铁地回答：“亲爱的孩子，在法国没有一个法庭能给你定罪。有人如此误解你的作品，并下令对它提出起诉，这非常令人遗憾。不过，为了我们国家和我们时代的荣誉，任何法庭都不能给你定罪。”事实证明，拉马丁的断言是真知灼见。面对《包法利夫人》这部杰作，面对德高望重的塞纳尔律师逻辑严密、雄辩有力的辩护，面对许多著名作家的声援和抗争，巴黎第六轻罪法庭虽然在“判决书”里指出，“在本庭受到起诉的这部作品应该受到谴责”，但不得不承认，公诉状所指控的段落，“无论是它们所阐述的思想还是它们所描写的情景，仍属于作者试图塑造的人物性格的范畴”，因而宣告作者福楼拜，以及《巴黎杂志》发行经理和印刷商“无罪”，“不予追究”。

这是一场了不起的胜利。它不仅是福楼拜的胜利，也是整个文学界的胜利。福楼拜本人充分意识到这场胜利的重大意义，他说：“我这场官司是整个当代文学的官司。人们攻击的不是我的小说，而是所有的小说连同创作小说的权利。”^[1] 统治者的倒行逆施往往产生与其愿望相反的结果。这场官司不仅为《包

[1] 福楼拜：《书信集》。

法利夫人》做了广告,使它在两个月内的销售量达一万五千册,此后又一版再版,而且进一步确立了这部作品的历史地位。

《包法利夫人》描写的是一位小资产阶级女性因不满夫妻生活的平淡无奇而通奸,最后身败名裂、服毒自杀的故事。这样一个桃色事件,无论在实际生活中,还是在以往的爱情小说里,都是司空见惯的。何以经福楼拜写出来,便惊动了帝国政府检察署——立即对作者提出公诉,给他加上“败坏公众道德,诽谤宗教”的罪名,要求法庭“必须严惩”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只要分析一下这部作品的思想内涵,便昭然若揭。

福楼拜写包法利夫人,着眼点不在写她的爱情故事,而在写她从纯真到堕落,从堕落到毁灭的前因后果及当时的社会状况。

爱玛出生于外省一个殷实农家。和许多乡下女孩子一样,她聪明伶俐,天真纯朴。可是,在19世纪上半叶的法国,无论巴黎还是外省的中上层资产阶级,都会把女孩子送进修道院接受一段教育,培养贵族式的思想感情和言谈举止,为日后进入上流社会打下基础。爱玛的父亲鲁俄老爹爱女心切,也赶时髦,把她送进鲁昂的修道院。爱玛生性敏感,感情热烈,想象力丰富,在修道院里,“修女们在训诫时,反复拿未婚夫、丈夫、天国的情人和永恒的婚姻这些概念进行比较,在她的灵魂深处,唤起意想不到的柔情”,而在宗教音乐课上所唱的抒情歌曲,全都“格调低下,音调轻浮,使爱玛窥见了诱人而又变幻莫测的感情世界”。在这种情况下,修道院禁欲主义的说教,只能起反作用,越发刺激她受压抑的情感和对爱情的遐想。不仅如此,1830年前后风靡人心的消极浪漫主义,配合天主教卷土重来的活动,也渗透进了修道院。正是在修道院里,爱玛接受了浪漫主义传奇小说的熏陶,成天满脑子想的是情男、情女、眼泪与吻、月下小舟、林中夜莺、凭窗盼望白翎骑士前来幽会的女城堡主。这些东西与她出生的环境和她日后的家庭生活格格不入。正是社会提倡的修道院教育,

腐蚀了爱玛稚弱的心灵，在她灵魂深处播下了淫靡的种子，做成了堕落的温床。试想，如果没有这种教育，日后的爱玛及其生活道路，必然会是另外一种样子。由修道院陶铸出来的爱玛·鲁俄小姐，怀着对爱情的憧憬结了婚，成了包法利夫人。包法利是乡镇医生，按理说在乡间算得上一个体面人物，可是他平庸无能，感情迟钝，与爱玛幻想中的骑士相差十万八千里。爱玛所期待的爱情没有到来，沃比萨尔的舞会却向她展示了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上流社会生活。在那里，她体验到了奢侈豪华的生活滋味，看到了养尊处优、浪荡调情的贵夫人，看到了曾经在王宫里很吃香、在王后娘娘床上睡过觉的老公爵，还同那位风度翩翩、颇有骑士派头的子爵跳过舞。这次舞会，是涉足社交生活的爱玛所上的第一课，使她在修道院时期所产生的天花乱坠的幻想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活方式，在她的心灵深处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后来在她的一切渴求和梦想的背后，都浮现出这次舞会的难忘情景。包法利夫人本来并不是个坏女人，尽管受了这些教育和影响，但是在迁居永维镇之后，她还是一度发狠躲避莱昂的追求，力图当一个贤妻良母，甚至试图帮助丈夫在事业上创造惊人的成就，名扬天下。但是丈夫太无能，太不争气，险些断送一条人命，这使她受到不堪承受的打击，觉得包法利这个姓氏给她带来的只有屈辱，因此本已岌岌可危的贞节观，才彻底崩溃了。她也一度试图到宗教中去寻求抵御情欲诱惑的力量，可是自称“医治人类灵魂的医生”的本堂神父，对她心灵苦闷的倾吐无动于衷，根本不理解，使她的希望彻底归于幻灭。社会给她制造了堕落的温床，她在本能地一再反抗、挣扎时，在社会上却找不到任何救助。罗多尔夫、莱昂这类道德败坏、专门玩弄女性的男人，却一再勾引她。这样，她便不可避免地成了他们的虏获物，最终堕落为无可救药的淫妇。

包法利夫人的致命错误在于，她不懂得豪华淫逸的生活和浪漫传奇的爱情，需要物质财富作为基础。她的家庭环境，无论她父亲还是她丈夫的家境，都不

具备这种物质条件，她却偏偏要去追求那种不可能属于她的生活。在她寻求爱情和幸福却沦为别人的玩物的过程中，她不知不觉地将丈夫的薄产挥霍殆尽，这便给高利贷者提供了可乘之机。唯利是图、精明狡猾的奸商勒乐，看准了包法利夫人的弱点和处境，拿物欲作为诱饵，让她签署一张又一张借据，使她积债如山，而一发现她身上再也没有油水可榨时，便串通法院，扣押包法利家的财产去抵债，并且张贴布告宣布拍卖。包法利夫人被逼到了家庭破产、身败名裂的绝境。她求助于情人，情人们推诿搪塞；她求助于税吏，税吏无动于衷；她求助于公证人，公证人花言巧语，企图乘其危难占有她。这时的人世，对包法利夫人是那样冷酷无情！在她面前只剩下一条路，就是结束她尚且年轻的生命。作者本人就说过：“就在此刻，我可怜的包法利夫人，正在法国的十二个村庄里受罪、哭泣！”^[1]被逼致死的包法利夫人遭到社会唾弃，引诱她堕落的情人罗多尔夫和莱昂，却逍遥自在，甚至步步高升。作品结尾的这一笔，更饱含了辛辣的讽刺和血泪的控诉。福楼拜说：“任何写照都是讽刺，历史是控诉。”^[2]这种讽刺和控诉，构成了《包法利夫人》强烈的批判效果。

《包法利夫人》强烈的批判效果，不仅仅体现在对爱玛命运的描写上。这部小说有个副标题，叫作“外省风俗”。除了爱玛的生活经历，它还给人们提供了什么样的外省风俗画呢？给人以鲜明印象的，首先是一幅形形色色的群丑图。这里有满嘴“进步”“科学”，实际上不学无术，却怀着政治野心、欺世盗名的药店老板奥梅；有自诩为“医治人类灵魂的医生”，实际上对人的感情一窍不通，浅薄可笑的本堂神父布尔尼贤；有道貌岸然、彬彬有礼，却满肚子男盗女娼，与奸商暗中勾结，中饱私囊的公证人纪尧曼；有唯利是图、奸诈狡猾、

[1] 福楼拜：1853年3月14日给科莱夫人的信。

[2] 福楼拜：1857年2月给普拉迪埃的信。

重利盘剥、置人于死地的奸商兼高利贷者勒乐；有灵魂肮脏、腐化堕落、随心所欲玩弄女性、纵情声色犬马的地主罗多尔夫；还有生活空虚、百无聊赖、整天摆弄旋床以消磨时光的税吏兼消防队长比内；等等。当然，乡镇医生包法利也应算其中一个，这是一个思想平庸、能力低下、感情迟钝、麻木不仁，做过“名扬天下”的美梦，但终因医术平庸，只好安于现状的人。够了，在一个外省乡镇，数得着的有头有脸的人物，基本上齐全了；要说缺，只缺一个乡村教师，因为那个时代在乡间，教师还不受人重视。作者把整个乡镇的头面人物，写得如此周全，几乎一个不漏，不能不说是一种着意安排。这些人算得上乡镇的精英吧，可是在他们之中，竟然没有一个坦荡君子，没有一个德才兼备之士，没有一个有德行的角色！他们全都是蝇营狗苟之辈！一个乡镇如此，推而广之，整个社会，不是可想而知了吗？这就是为什么《包法利夫人》虽然写的是外省一隅，却具有震动整个社会的力量。

作为外省风俗画，作品中以浓重的色彩、渲染的笔调，描写了一个“农业评比会”。这是当局宣扬成就、刺激农业生产发展的一次盛会。会场上张灯结彩，敲锣打鼓，鸣枪放炮，一派在永维镇难得见到的节日景象。就在这非凡的热闹气氛中，各种头面人物，上至省府参事，下至本地乡绅，粉墨登场。其中，药店老板奥梅，上蹿下跳，出尽风头；教堂执事赖斯迪布都瓦，趁机向参加会议的农民出租教堂的椅子，大捞外快；省府参事在主席台上发表演说，大肆吹嘘全国农村的进步和政府对于农民的关心；罗多尔夫钻到二楼，甜言蜜语勾引包法利夫人，两个人一个慷慨激昂，一个窃窃私语，形成了一曲令人忍俊不禁的二重唱；而主席台下的整个会场，人群吵吵嚷嚷，牛哄羊哄，乱成一片。一个庄严隆重的评比会，变成了一幕滑稽可笑的闹剧。不仅如此，在大会主席宣布的长长一串获奖者名单中，有一位给地主干了五十四年活儿的老太太，人又老又瘦，脸上的皱纹比风干苹果上的还多，身上穿着破衣服，两只手长年接触谷

仓的尘土、洗濯的碱水和羊毛的油脂，粗糙发硬，疙里疙瘩，合也合不拢。而她半个多世纪的辛劳所换来的奖赏，只不过是一枚仅值二十五法郎的奖章！作品精心安排这样一位被剥削制度压榨干的农妇作为获奖者的代表，不正是对省府参事所唱的高调，对这次所谓评比会的抗议吗？会议结束后，头面人物全都留下来大吃大喝，而群众散去，“人人回到原来的地位，一切照旧：主子依旧粗暴对待仆人，仆人依旧鞭打牲口”。这是多么尖刻的讽刺，多么有力的批判。而这种讽刺和批判所针对的，从作品中不难看出，是政府，是最高当局，甚至是国君。

《包法利夫人》的故事发生的背景是七月王朝，但它所揭露和批判的，主要是第二帝国的社会现实。难怪作品一问世，就立刻掀起轩然大波，“遭到政府攻击，报纸谩骂，教士仇视”，帝国政府迫不及待地要拿作者问罪。这正是这部作品的巨大成功，正是这部作品继《红与黑》和《人间喜剧》之后，成为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又一部杰作的根本原因。

作为继《红与黑》和《人间喜剧》之后，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又一部杰作，《包法利夫人》不仅思想内涵上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批判效果，而且艺术风格上在继承现实主义传统的同时，取得了革新性的突破，在法国甚至世界文坛，获得了普遍赞誉和高度评价。拉马丁说这部作品是他“二十年来读到的最优秀的作品”^[1]。波德莱尔赞扬福楼拜“肩负了开辟一条新路的使命”^[2]。圣勃夫评论说：“在许多地方，我觉得从不同形式下看到了新文学的标志。”^[3]左拉宣称“新的艺术法典写出来了”^[4]。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则认为：“完美无缺的《包

[1] 拉马丁：1857年1月30日约见福楼拜的谈话。

[2] 波德莱尔：《波德莱尔全集》。

[3] 圣勃夫：《包法利夫人》，1857年5月4日《世界箴言报》。

[4] 左拉：《居斯塔夫·福楼拜》。